

中国近现代

*Zhong guo
Jinxiandai Waijiaoshi*

外交史

吕厚轩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

吕厚轩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吕厚轩主编.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07-5364-5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外交史—中国—近现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820 号

责任编辑: 李孝德

封面设计: 牛 钧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

规 格: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7.25 印张 3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编委会

主 编 吕厚轩

委 员 胡 静 王 玮 吕亚云

陈梅雨 马 蕾

目 录

| | |
|---|-----|
| 导 言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中国近代以来对外观念的演变与 现代外交的展开 | (1) |
|---|-----|

第一编 晚清的外交

| | |
|--|-------|
| 第一章 西方的入侵与闭关政策的破产(1840~1860) | (11) |
|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西交往体制 | (11) |
| 第二节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与中英冲突 | (19) |
| 第三节 鸦片战争与中英南京条约 | (26) |
| 第四节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交涉 | (34) |
| 第五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外交涉 | (38) |
| 第二章 清政府建立新型对外关系的尝试(1861~1894) | (46) |
| 第一节 洋务思想的形成与“外须和戎”政策的确立 | (46) |
| 第二节 近代外交制度的初步建立 | (52) |
| 第三节 《万国公法》的引入与中外关系的调整 | (56) |
| 第四节 边疆危机时期清政府的对外交涉 | (66) |
| 第三章 宗藩体制的崩溃与晚清现代外交的展开(1895~1912) | (82) |
| 第一节 中日甲午战争与宗藩体系的崩溃 | (82)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列强在华均势局面的形成 | (91) |
| 第三节 清末外交现代化的努力 | (101) |
| 第四节 清末外交的无力抗争 | (109) |



第二编 北京政府的外交

| | |
|--------------------------------|-------|
| 第四章 民国初年的妥协外交 | (119) |
| 第一节 革命党人的“过渡外交” | (119) |
|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外交 | (123) |
| 第三节 民初北京政府的维持外交 | (127) |
| 第五章 日本破坏中国均势的阴谋 | (138) |
| 第一节 日本参加“一战”与“二十一条”的提出 | (138) |
| 第二节 中国的参战外交 | (145) |
| 第六章 列强在华均势的重建 | (155) |
| 第一节 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 | (155) |
| 第二节 苏联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及其对于中国的影响 | (162) |
|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 | (166) |
| 第四节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 | (174) |

第三编 民国南京政府的外交

| | |
|---------------------------------|-------|
| 第七章 南京政府初期的外交选择 | (185) |
| 第一节 南京政府的建立与“联美抑日反苏”政策的出台 | (185) |
| 第二节 从“革命外交”到修约外交 | (193) |
| 第八章 日本扩大对华侵略与南京政府外交的调整 | (198) |
| 第一节 日本的军事侵略与南京政府的消极应对 | (198) |
| 第二节 “以夷制夷”的外交 | (205) |
| 第三节 日本入侵华北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 (213) |
| 第九章 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 | (222)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之初中国的外交困境 | (222) |
| 第二节 抗战相持阶段“积极促变”的中国外交 | (232) |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国外交” | (237) |
| 第四节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的外交 | (246) |
| 第十章 国共内战时期的外交 | (253) |
| 第一节 接受日本投降与战争问题的处理 | (253) |
| 第二节 联合国的创立与“大国”外交的延续 | (258) |
| 第三节 内战时期的对美外交 | (262) |

| | |
|----------|-------|
| 后记 | (271) |
|----------|-------|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中国近代以来对外观念的演变与现代外交的展开

“外交”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很早即已出现，但其意义与近代西方之外交完全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群雄并起，列国林立，形成当时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及使节的交往。当时的“外交”，多是指为人臣者私见诸侯或者个人之间的际往来。《国语·晋语》曰：“彼若不敢而远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不亦可乎？”《礼记》云：“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待秦汉一统后，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交聘制度，亦不复存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多持“天下国家观”，天下即是国家，没有出现西方近代以后所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西方，从词源上讲，“外交”(diplomacy)一词与“外出”有关，该词是希腊语(diploma)的派生词，意为“一折为二”，即用两块折合连接在一起的金属片做的护照或其他通牒。直到18世纪，这个词才被用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或调整方面。1796年，埃德蒙·柏克使用“diplomacy”一词，意思指处理国际交往和谈判的技巧和谈吐。从此，现代意义的外交概念才流行开来。^①

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交(foreign affairs)，系指主权国家政府开展的对外交往事务；狭义的外交(diplomacy)，指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谈判的科学和艺术，按照英国外交家萨道义的解释，外交“是运用智力

^① 参见王福春、张学斌：《浅谈外交和外交思想：兼评陈乐民先生主编的〈西方外交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①。现代外交一般被看作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开始的，米兰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尤其重要的作用，它首先开始在意大利北部其他城市里设立常驻大使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

中国人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近代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一直受古代形成的天下观所支配，直至清王朝统治后期，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才开始崩解。面对逐渐展开于眼前的一个全新世界图式，大多数中国官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难以理解。但是，关于新世界的观念并没有因为中国人的排拒而改变，在西方列强的强力压迫下，中国人不得不慢慢接受现代世界的观念，学习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逐渐调适自己的对外理念及行为，在屈辱中被迫接受了西方人的理念和规则，努力融入现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心境颇为矛盾：一方面，因为实力差距，不得不接受西方人主导的各级规则，争取西方列强的认可；另一方面，因为理念不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又颇有微词，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对其加以改造。

因此，要了解近代以来中外交往的种种冲突与不快，必先了解双方在对外交往中所秉持的理念，才能对其在交往中的种种表现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对于世界图式的建构，尽管随地理认知的扩张而屡有变迭，但其要旨大抵一以贯之，即所谓的“文化的天下观”。从殷商的内外服制到战国后期的“夷夏之辨”，从血缘亲疏到文化异同，经过历史的长期演进，中国人对于世界图式的叙述至此大致确定下来。^②这个图式由“本不相干的方位观、层次观和文化的夷夏观交织而成。天下由诸夏及蛮夷戎狄组成，中国即诸夏，为诗书礼乐之邦，在层次上居内服，在方位上是中心；蛮夷戎狄形同鸟兽，在层次上属外服，在方位上是四夷。方位和层次可以以中国为中心，无限地延伸；诗书礼乐的华夏文化也可以无限地扩张。最后的理想是王者无外，合天下为一家，进世界于大同”^③。

也就是说，天下既然作为儒家道德秩序统治范围，必定可以根据接受儒家

① [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参见陈廷湘、周鼎：《天下 世界 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③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454～455页。

道德的程度分成若干等级。完全接受儒家伦理的地区，可以纳入中央王朝的郡县制，作为礼仪之邦，成为天下的中心；正在接受儒家伦理的地区，其道德水平比中央王朝低一等，它们虽不能将家族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纳入现行郡县制管理，但中央王朝可以通过册封将其想象为接受郡县制，从而要求这些地区必须对中央王朝实行朝贡；那些儒家伦理未能惠及的地区，道德水平更低，只是教化的对象，中央王朝可以接受他们的朝贡，但不对其进行册封；至于那些完全不了解、不接受儒家道德的地区，则处于天下之外，是微不足道的夷。换言之，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所构筑的同心圆政治秩序。这个秩序，藉礼的亲疏原理，展开中国与四夷的关系”^①。在这种同心圆等级结构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根据道德水平高低，分成夷和藩，处在天朝帝国的周围。由于世界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而不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集合，故中国的天下观亦可称为“华夏中心主义”。这种华夏中心主义支配下的天下观，强调了基于国内礼仪秩序的朝贡体制，强调了“华夷之辨”，强调了天下一统，从体制上和观念上堵塞了平等处理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体系中，与天朝关系最不密切且往来最少的，即是西方诸国。此一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在交通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欧洲与亚洲因为地域隔绝而很少接触，即使有所谓西方国家贡使前往中国，也是贡无定期；另一方面，中国秉持天下观念看待外在诸国，西方国家皆在最外圈，他们不接受中华文化，所以西方人在中国人眼里，为典型的“蛮夷”。因此，传统中国与西方诸国的“外交”，几近于无。

近代以前的中西交往，主要集中在商业方面。中国与西洋各国的海路通商，以明正德年间(1516)葡萄牙人来华求市为嚆矢。其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及英国都先后来中国通商，尽管当时的贸易量不是很大。在明代，明政府对外政策十分宽大，凡遣使进贡者，皆准许他们携带货物与中国商民互市。事实上，中外通商主要是在此模式下进行的。为能在中国开展贸易和赚取丰厚利润，不少欧洲商人自称是贡使。而明政府认为通商乃“嘉惠远人”的表示，所以是无可厚非的。

工业革命发生后，由于科学及技术的发展，不但缩短了东西方地理上的距离，而且由于生产机械化，生产力大大提高，西方国家需要寻找海外市场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来华的欧洲商人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随着欧洲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确立，西方各国已逐渐不能容忍中国以不平等的方式看待他们，更不满中国以“蛮夷”相称。最重要的是，欧洲商人希望能在中国自由贸易。然

^①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61页。



而,当时的清政府仍承续中国传统对外观念,不愿作任何改变,故对待西方通商之国,仍沿用朝贡时代的各种礼仪与体制,导致中西之间的关系面临种种困难和紧张。

中西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始于广州一口通商制度的确立。乾隆二十二年(1757),鉴于来华“夷商”人数增多且不好驾驭,为便于政府管理,清政府决定仅在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其他口岸及内地,外人一律禁止进入。清政府的这一决定,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其中,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英国反应最为激烈。在经历了几次和平交往的尝试失败之后,英国以鸦片为借口发起战争,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起,实际上是两种理念、两种体制的冲突。西方人要求在中国自由贸易,以便攫取财富,而清政府根本不在乎经济利益,它担心西方人的到来会破坏“天下”的既成秩序,进而引发中国内乱,因而力图将对外交往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当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理念合情合理时,中西冲突即不可避免。

西方列强的入侵,激化了中国本已激烈的社会矛盾,随即引爆了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部分儒臣和士大夫们重拾“经世致用”之理念,一方面应付内部动乱,一方面抵抗西方文明的冲击。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正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大扩张的时期。当西方列强用武力和民族国家体制下的国际条约体系来对付清政府时,必定和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产生冲突,这直接导致了19世纪60到80年代清政府面临的全面边境危机。列强通过武力及恐吓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起所谓的国际条约体系,希望以此来保证在华权益。这种条约体系,正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秩序对中华天下秩序的蚕食。

在1860年代开始的全面边境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官员和绅士才开始认识到中国置身的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巨大变化。1872年,李鸿章针对内阁学士宋晋“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的奏议,指出:“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他进一步说:“中国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①在这种危机意识支配下,如何在与外国不可避免的冲突中维护本国权益,也就成为中国官员和绅士们不得不面临的极为现实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经世致用的原则也贯彻到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和方式中。我们把这种通过

^① 《李鸿章全集》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经世致用改造了的传统天下观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

万国观从两个方面修正了传统天下观：第一，承认世界格局已大变，中国只是万国中的一国，而且是被西方列强欺侮的一国；第二，与外国打交道的行为准则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只有从天下观转变为万国观，才可能以《万国公法》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准则。^①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天下观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的差别仅在于：万国是中国必须认知和打交道的对象，即经世致用使天下观变得积极有为，并强调和国际接轨，但并没有改变华夏中心主义的本质。很多士大夫们在谈《万国公法》时，都要先指明它是本着儒家性理的。即使像王韬这样思想十分开放的士人，仍不能突破传统——把中国视为天下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他一方面撰文指出，很多人仍不了解“分离之象，天将以此而变千古之局”；他认为，与“泰西各国”相比，中国“其所不足者，武备之精，机变之巧”而已，到今天“渐无畛域之分，彼之所能，我亦效之，我之所短，彼则授之”，如战舰、机器、开矿以及火车轮船通标电线，“一切可以无远弗届，无微不通者，莫不纷纷则效，以速其成”。由此，他大胆呼吁：“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王韬之所以敢于提出向敌国学习，是因为他的出发点仍是“纲常则亘古而不变”。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造成了“各域一隅，各长一方，不复知有圣教，三纲沦而五常斲”；而当时“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一旦圣人出而四海一”，就可定于中国的“大一统之尊也”。因此，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虽然已认识到世界局势已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国应以积极态度“师夷之长技”，但是，仍然不过是对传统天下观的修正。^②

在万国观念的支配下，清政府对外交往的体制和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在外交体制上打开了缺口。这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涉机构的出现，是中国外交近代化起步的标志。当然，此时的清政府，仍未明了现代外交的内涵，依然将通商等事务看成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而其对外观念和处理外事的方式已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1864年后，《万国公法》刊刻出版，公法外交逐渐成为清朝官员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途径。1876年，郭嵩焘带人在伦敦建立第一个驻外使馆。郭嵩焘本人虽遭到保守派的冷嘲热讽，甚至猛烈的人身攻击，但清政府外交体制的近代化已不可逆转。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之所以这样

^①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

^②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37～238页。



说,是因为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万国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去中心化,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在中国萌芽并逐渐成长。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原因当然是日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扩张野心;但就中国方面看,与万国观取代传统天下观有一定的关联。因为万国观仍是以中国为中心,这就要求中国捍卫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对朝鲜的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更何况朝鲜临近京师地区,直接影响其安危,比越南更重要。因此,当1882年朝鲜发生事变后,李鸿章马上指示吴长庆带兵戡乱,此后清军常驻朝鲜,就是积极加强干预的表现。

但甲午一败,使得中国不仅在西方列强面前颜面扫地,即便在亚洲对日本也要低三下四。此后,残存在多数中国人脑海中的天下秩序彻底崩解,万国观开始去中心化,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中的普通一个。前面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不同道德水准的国家组成;二是中国儒家伦理在道德上优于世界万国,所以以中国为中心。甲午战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朝野士大夫对儒家伦理优越性和儒家提供的社会组织蓝图产生了怀疑,中国也不再处于用道德教化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华夏中心主义从此解体。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万国须要以某一种文明模式为中心的心态,只不过西方列国(包括学习西方成功的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甚至包括道德)都可能比中国优良,是中国学习效法的榜样。其后果是中国不再成为万国之中心,对外开放、引进敌国制度,也就成为天经地义之事。^①

甲午一战,清政府败给日本,如果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中国人应对日本恨之人骨,欲除之而后快。相反,战后中国掀起一股去日本留学的热潮,这反映了当时去中心化的万国观具有很强的世界主义的性质。与甲午战后万国观去中心化同步的,是变法思潮勃兴。康有为在当时主张:“今宜立使才馆,选举贡生监之明敏辨才者,入馆学习,其翰林部曹愿入者听,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学成或为游历,或充随员,出为领事,擢为公使,庶几通晓外务,可以折冲。……其余分遣品官,激励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能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则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②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流亡日本的中国维新人士开始反省传统天下观,思考什么是国家。19世纪最后两三年,中国的国家观念急遽转变。1900年,梁启超撰文指出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弊害,他说:“是故吾国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

^①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240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1~152页。

国家为何物，因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他尖锐地批评说：“此实文明国民之脑中梦想不到者也。”既然天下观应被文明国民所唾弃，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国家又是谁的呢？梁启超接着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是谁？即一国之民是也。”^①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提出了自己的近代国家观，“然则所谓国者将何如？曰：自外视之，则土地虽割而国不亡，朝代虽易而国不亡，政府虽复而国不亡，惟失其主权者则国亡。……自其内视之，则人民也、君主也、官吏也，皆隶属于国者也。譬如一公司，人民其股东也，君主其会计也，官吏其司事也，聚股东、会计、司事各人而谓之公司，举人民、君主、官吏各部而谓之国，其义一也”^②。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勃兴、学习西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期。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兴起与传播，对于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随着万国观的去中心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观。“世界”一词本出自佛教，《楞严经》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也就是说，“世界”一词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并强调其流变的性质。中文古文献中，也曾用“世界”指涉时世、众人、局面。世界和天下最大的差别，是“天下”乃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即与天道相关联，而“世界”则用于表达变化中的事物和人类时局。据金观涛的研究，1899年后“世界各国”和“万国”虽然并用，但前者有逐渐取代后者之势，“万国公法”亦被称为“国际法”。“世界”作为流变和演化的观念取代万国观时，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盛行之际。这样，“世界”所指涉的社会组织蓝图在现实方面必定注重进化和进化机制，即“世界”是在进化中日新月异、万象更新。

随着世界观念的流行，中国开始追求成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即 family of nations。Family of nations 是当时用来表示国际社会的词语，而要取得进入国际社会的完全成员资格，要件就是成为所谓“文明国”。日本学者川岛真认为，“文明国化”的趋向从 1880 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产生，到戊戌变法时由中央明确提出，而举国形成潮流则是在光绪新政时期之后。在外交领域，1890 年代后半期划分胶州湾等租借地引起“瓜分危机”，1899 年和 1907 年清政府参加第一、二次海牙和会，这些都对外政官僚世界观的转化和文明国化使命感的酿成具有重大意义。^③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五》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5～16 页。

②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1 卷（上册），三联书店 1977 年版，第 64 页。

③ 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田建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10 页。



为尽快实现文明国化,20世纪初,清政府在推动外交近代化方面表现出了积极姿态。庚子事变中,慈禧与光绪的仓皇“西狩”,让清政府颜面扫地,权威尽失。此时的清政府,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一方面要通过外交的近代化与列强搞好关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改革,重新收拢人心,重建政治权威。因此,变革成为晚清最后十年的主旋律,外交体制的变革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1901年,总理衙门正式改称“外务部”。经过晚清十年的不断改造,外务部已经具备了一个近代外交中央行政机构的特征。此时,清政府的驻外体制、外交官培养体制等等,逐渐向制度化和专业化发展,新的中国外交体制架构初步完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起点。^①

民国建立后,“排满”之声迅速偃旗息鼓,“五族共和”的呼声成为主流,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视为急务。与此同时,他们并未放弃文明国化的追求。后来,孙中山在梁启超大民族观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积极主张融合国内各民族,建立大民族国家。自此之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一步步深入中国人的头脑,传统的天下观念彻底被抛弃。从外交史的观点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伴随着进退维谷、迂回曲折的过程,中国“近代外交”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②

① 参见李兆祥:《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② 参见[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田建华校,第16页。



第一编

晚清的外交

第一章

西方的人侵与闭关政策的破产 (1840~1860)

清朝建立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基本继承明朝旧制,在亚洲维持着传统的朝贡体制。尽管不断东来的欧洲人试图改变这一国际秩序,要求清政府平等相待,但均以失败告终。1840年,英国政府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利用坚船利炮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打开一个缺口,清政府的对外体制开始出现松动。更为重要的是,鸦片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士大夫的对外观念,中国传统的驭夷之术开始出现裂变。

第一节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西交往体制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并凭其优越性,不断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国家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在西方,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结束,1648年,各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体系内各国在主权相互独立的基础上都要遵守和约并根据一系列国际法规则来进行交往的平等体制,史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